

访谈录|资讯

← (上接11版)

译。“四书”的译本作为耶稣会士的教科书代代相传，传到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不同的版本了，广州中山大学的梅谦立老师有相关研究。耶稣会士还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像《赵氏孤儿》就是法国传教士翻译的，曾经在18世纪的法国、英国引起过重要的反响。

第三点与礼仪之争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最早是教会内部对教义的争议，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天主教徒是不是可以祭祖这一点上。这个争议不仅涉及中国礼仪，还涉及印度、波斯的教徒是否能够同时信奉某些自己的民族礼仪。对于天主教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全球传教的争议，最后也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广泛讨论。这可能也是欧洲中国热的一个间接因素。

文汇报：欧洲传教士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有怎样的互动？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明清的思想文化有何启发？

夏伯嘉：在科学方面，耶稣会士往往有很好的科学基础。利玛窦受到中国知识阶层欣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很好的数学、天文学、逻辑学等科学知识。这并不是利玛窦的特殊性，而是耶稣会本身训练的结果。在耶稣会书院里，数学是必修课。虽然大部分耶稣会士不会把数学作为主修方向，可是利玛

窦在数学方面下过功夫。他并不是特例，欧洲也有耶稣会士同时也是杰出的物理学家与天文学家。清代数学的复兴与晚明西学的传入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康熙对西方文化，特别是对数学、天文学是很有兴趣的。我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馆看到过康熙用过的一些三角、圆规等数学工具。数学家梅文鼎也受到了西学的影响。北京的韩琦老师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研究，他认为中国数学的发展跟西学的传入有很深厚的关系。

在哲学方面，明清耶稣会士喜欢和中国人讨论哲学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宋明理学。这是因为耶稣会士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哲学训练。他们把这些当作治学的第一步，因为哲学最早、最初级的课程是逻辑学。他们读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因为学习辩证法之后才能够理清哲学的问题。有了逻辑学的基础之后，他们再去读神学。在神学方面，《圣经》是主要的课本，但它并不是系统的著作，所以需要通过对辩证法这种哲学的方法来整理出一些有条理的教义。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看来中国哲学最大的贡献是伦理学，最大的缺点是没有逻辑学。中国没有逻辑学跟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先秦的名家与墨子的思想中有逻辑学的方法，可是名家在战国以后就没有了；《墨子》也不是显学，不是科举要读的课本，它的传播

在中国也不是很普遍。《墨子》其实是注重用逻辑的方法来辩证的，可是它对儒家主流文化没有产生过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是中国跟西方哲学的很大不同。因此，龙华民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来批评中国的哲学，艾儒略用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三分论来驳斥宋儒的天人合一理论，都是有这样的背景。他们在耶稣会接受了西方哲学的训练，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面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时候用到这些原来的思想基础。

在语言文学方面，传教士为了学习中国语言用罗马字来为汉字注音，其实对中国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其实这是中国语言学里面最难的一门学问，因为汉语书写本来是没有语音可以记载的。罗明坚和利玛窦编的第一本《中葡字典》里面就用拉丁文来注语音。后来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对中文字音作了一个系统的整理。赵元任是中国音韵学的鼻祖，他就读过金尼阁的书。此外，明末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也会写诗。因为中国人喜欢以文会友，文人聚在一起喜欢作诗。耶稣会士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罗明坚就写了一些诗。他的诗应该是自己写的，因为在押韵等方面都不太准，可是总体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很长时间内我们都不知道耶稣会士写过诗，直到1990年代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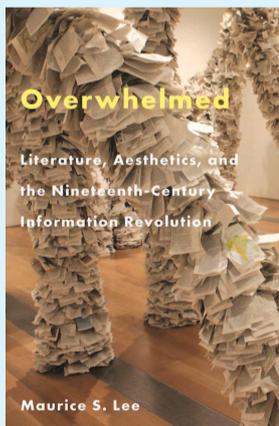
徐光启和利玛窦画像

人发现并出版。利玛窦没有写过诗，但有很多文人会赠诗给他，包括李贽。我在罗马看到一个手稿，是用中文白话文写的，年代很难确定，但好像是晚明的。写的是传教士跟中国人讨论为什么一夫一妻比一夫多妻要好。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它是白话文的对话体。这个比较像文学的体裁，是很有意思的。

以前我们会觉得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国

家。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国自古到今都是与域外文化有互动的。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多学外语，到外国留学；看问题要更宏观一些，既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也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历史学家是在跟历史、跟古人对话。要是我们有更丰富的历史对话，就会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生活，可以把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更加丰富化。

《不知所措：文学、美学与十九世纪的信息革命》 (Maurice S. Lee,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在信息革命中，文学会发生什么？读者和作家如何适应不断增长的数据和文本？在信息过载、大数据和数字人文的今天，这些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担忧在19世纪并不新鲜，因为印刷品的迅速扩张在文学和信息之间也创造了新的关系。

作者钻研了19世纪的英美文学，包括柯勒律治、艾默生、夏洛特·勃朗特、霍桑、狄更斯的经典著作，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文本，如通俗冒险小说、标准化文学文本、古典期刊和早期统计文学批评。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即19世纪的文学和信息并非像一代又一代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相互矛盾的，它们以令人惊讶的协作方式纠缠在一起。

用这样一个有历史根据的视角，本书通过审视前一个信息时代，为今天关于数字人文、人文危机和文学前景的辩论提供了新的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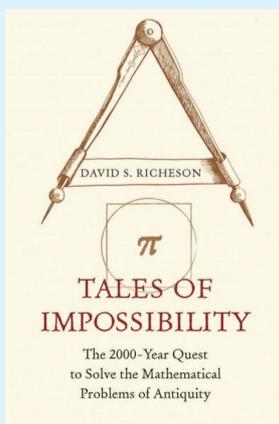
《不可能的故事：2000年来对于古代数学问题的探索》 (David S. Richeson,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古代数学史上最著名也最吸引研究兴趣

一周英文新书

四个问题。这些问题最初是由古希腊人提出来的，作者跟踪了它们的发展轨迹，证明了其最终得到证实仅仅依靠指南针和直尺是不可能的，从而促进了数学的进步。

作者调查了历史上著名人物，包括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笛卡尔、牛顿和高斯等是如何进行探索，以及有多少重大的数学发现是与他们的探索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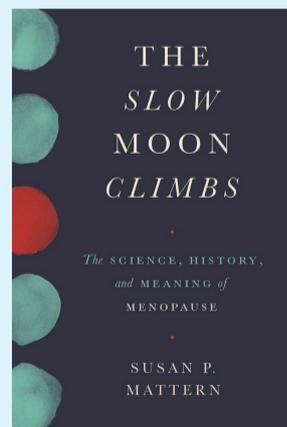


的。尽管这些问题是以几何学为基础的，但解决方法并不是，而且一直等到19世纪实数和复数、解析几何学、代数和微积分理论的发展。书里还讲了好几个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趣闻，比如印第安纳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为圆周率设定错误值的法案，达芬奇甚至也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登月：更年期的科学历史意义》 (Susan Mattern 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我们看待更年期的方式都错了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者在书中肯定：我们的确错了。她利用历史、科学和文化研究来揭示我们对更年期的看法是如何从史前发展到今天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更年期没有任何概念，也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

作者研究了著名的“祖母



假说”——它论证了长辈在养育后代中的重要性以及其他进化理论，这些理论对更年期及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见解。她还探讨了更年期作为一种医学状况在西方出现的过程。一直到1700年左右，更年期才被视为一种危险的病理性疾病，与导致妇女越发虚弱和脆弱的一系列症状有关。

本书当然也呈现了更年期积极的一面——它是生命必不可少要经历的阶段，而且是人类繁荣昌盛的一个关键因素。